

翻译符号学的三域问题剖析

贾洪伟

(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英语部;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摘 要: 雅可布森于 1959 年提出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 因存在界限不清、层次错置等逻辑问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受到国际学界的批评, 但这些反思性作品依然存在以文学作品的狭义语际翻译为重心, 忽视了同一民族文化和不同民族文化范畴内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因而有必要参考洛特曼于 1984 年提出的符号域以及霍夫梅耶于 1993 年拓展的符号域, 对符号域加以重新界定, 并结合翻译符号学研究的需要, 与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的现实, 提出并阐释域内翻译、域际翻译和超域翻译三类范畴, 探讨三域的本质、构成和内涵。

关键词: 域内翻译; 域际翻译; 超域翻译; 问题与剖析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 (2020) 1-10098-12

一、引言

1979 年, 翻译学家图里 (Gideon Toury, 1942-2016) 在维也纳国际符号学大会上宣读论文《翻译文本中的交际——符号学路径》(Communication in Translated Texts: A Semiotic Approach) 且在结尾处提出翻译符号学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这一学科称谓, 但未受到及时的重视, 后略有从皮尔士、维特根斯坦等人有关符号的角度探讨翻译问题, 被美国翻译学家奈达 (Eugene A. Nida, 1914-2011) 收入有关翻译过程的相关阐述。1990 年, 格雷 (Dinda L. Gorfée, 1945-) 在《翻译即叛逆: 论翻译符号学》(Traduttore Traditore: Semiotica de la Tradicción) 中提出“翻译符号学”

收稿日期: 2019-12-07; **修回日期:** 2019-12-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口译过程的认识论构建与人工智能口译研究”(19BYY1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复合同性视阈下的中国近代间接翻译研究(1898-1937)”(19BYY118)

作者简介: 贾洪伟, 副教授, 博士后, 研究方向: 翻译符号学、语言学译介史

这一术语。三年后特鲁普 (Peeter Torop) 撰文《翻译符号学与符号学翻译》(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f Semiotics) 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后在《走向翻译符号学》(Towards the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2000)、《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前景》(The Possible Fate of the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2001)、《翻译与符号学》(Translation and Semiotics, 2008) 等中探讨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学科本质与属性、内在构成、学科前景等 (贾洪伟, 2016a),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翻译符号学研究的进程, 但仍囿于文学文本和语际翻译范畴, 依然从翻译角度界定翻译符号学术语, 没能从学科的视角界定翻译符号学概念, 建构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贾洪伟 (2016b) 和 Jia (2017) 以雅可布森于 1959 年提出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①存在的界限不清问题为切入点, 梳理先前国际学界对其作出的批评, 从翻译符号学视角指出该翻译分类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参考洛特曼于 1984 年提出的“符号域”及其相关思想, 结合翻译符号学涉及的符号活动范围, 提出域内、语际和超域 (或曰多域) 翻译范畴。但是, 二文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三域的内在构成和框架, 可仍不够系统和充分, 故有必要对其加以重新剖析和建构。

二、问题回顾

根据 2017 年 8 月 7 日中国知网主题“域内翻译”、“域际翻译”、“超域翻译”搜索结果, 目前国内仅有贾洪伟 (2016b) 一篇相关成果, 外加该作者 2017 年在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符号学研究》(Chinese Semiotics Studies) 上发表的《雅可布森翻译三种类型再思》(Roman Jakobson's Triadic Division of Translation Revisited), 目前共获得相关文献两篇。

贾洪伟 (2016b) 以 Toury (1986), Gorlée (1994), Torop (2002) 与黄忠廉 (2015) 等在不同程度上批判 Jakobson 于 1959 年提出的翻译三种类型为切入点, 指出雅氏翻译类型存在四种问题: (1) 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 将动态的符号活动作静态的二元对立处理; (2) 修改了皮尔士解释项的逻辑指称范围, 弱化了所指对象的指称关系, 将其纳入索绪尔二元符号学范畴; (3) 忽视了符指过程中人作为符号发明者、使用者、阐释者的作用; (4) 语际与符际翻译之间界限不明、错层并列, 疏漏颇多, 未考虑到反向翻译、合译、转译、编译等范畴。在此基础上, 作者参考 Lotman (1984) 提出的“符号域”概念及其相关思想, 建构适用于翻译符号学的域内、域际和超域三重译域。

Jia (2017) 以 Toury (1986), Eco (2001), Torop (2002), Gorlée (2010) 与黄忠廉 (2015)、贾洪伟 (2016b, 2016c) 等在不同侧面和程度上批评 Jakobson 于 1959 年提出的翻译三种类型为切入点, 指出雅氏翻译类型存在的四种问题 (同贾洪伟 2016a), 评述上述作品有关批评、分析和建构中存在的问题: (1) 逻辑层次不清, 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2) 分析与新建构局限于以语际翻译为核心, 将翻译作狭义指称界定, 忽视了符号活动的本质与符指过程的现实; (3) 分析与建构囿于文学文本

一端,无视其他题材,忽视了广义翻译界定下的转译、反向翻译、合译以及从小说到舞台演出,再到多介质合成的复合文本。作者参考 Lotman (1984) 提出的符号域概念及其相关思想,并将其加以重新厘定为空间介质,用以建构适用于翻译符号学的域内、域际和超域三重译域。

基于上述二文的前期构建,本文有必要从多角度进一步厘定域的概念所指范畴,区分域内、域际和超域翻译范畴之间的界限,重新明确三域的下位范畴关系。因域的概念所指范畴乃后两个问题探讨之基础,故而有必要事先加以厘定。关于符号域, Lotman (1999: 165) 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处于一个符号空间之内,只有与这一空间相互作用,语言才能实现其意指功能(即皮尔士之符指)。语言并非孤立地存在,而需附属于所在文化的整个符号空间之中,故应被视为一个符号单位、一个不可分解的运作机制,这一空间被定义为符号域。”从翻译符号学的角度看,这一定义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 洛特曼以语言为切入点,只考虑到翻译符号学所言的有形符号之语言符号,忽视了广义符号活动或曰符指过程中所涉及的非语言符号以及不依存于外部空间介质存在的无形符号,即依存于大脑神经系统作为内部空间介质的思维符号,参见贾洪伟(2016a, 2016b, 2016c)有关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的阐述;(2) 符号空间不但有依存于外部物质介质的符号空间,还有依存于大脑神经系统作为内部物质介质的符号空间,若从时间维度看,更有历史符号空间和当前符号空间之分;(3) 同一空间的符号被视为一个符号单位、不可分解的运作机制,蕴含着依存于不同空间的符号之间存在互动和关联,这不但是可译性的基础,更是符指过程中信息能量守恒的基础;(4) 文化对符指的约束作用不仅体现于符号所附属的符号空间,同一文化范畴之不同时间范畴的空间之间也存在互动与关联,毋宁说不同文化范畴之符号空间了,也因此才有了文本间性和互文性之论的存在;(5) 若以洛特曼的符号域为纲,从一个文化空间到另一个文化空间,不论是从空间还是从时间维度说,都属于空间际转换(即域际转换),即使是同一文化(范畴)空间的内部转换,也是从一个次空间进入另一个次空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狭义域内转换(贾洪伟, 2016b: 15),这一命题唯一能否存在的条件是以符号所附属的文化为参考依据,但洛特曼符号域的根本并非是文化,反倒是附属于文化的符号构成的空间。最后,亦如科托夫与库尔所言:“符号域并非是物质,而是符指关系构成的整个集合”(Kotov & Kull, 2011: 179),将符号域等同于符指关系,不免出现了逻辑错层的问题。

相对而言, Jia (2017: 40) 的分析和界定更为完善,将洛特曼的符号域改写为 the medium or space carrying the signs of a given culture in different times (承载不同时期特定文化符号的空间或介质),但忽略了特定文化之所指远不如民族文化范畴那么界限分明,容易使人误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归入不同的文化范畴,从而打破了中华民族文化这一统一体,甚至会削弱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权地位。作者用大脑神经系统作为承载无形符号的物质介质,予以区分承载同一文化范畴符号的内部空间

(inner space) 和承载不同或异域文化符号的外部空间 (outer space), 在该文本内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这是该文可资借鉴的一大优点。Jia (2019) 回顾了彼得里利有关符号域应用于翻译和翻译符号学研究的言论: “如果我们脱离洛特曼所描写的‘符号域’边界, 即人类文化域, 翻译就延展至整个有机世界; 也就是说, 延展至任何存在符号和符指过程之处。换言之, 翻译在整个生物域肆虐, 抑或是为了拓展洛特曼的‘符号域’, 翻译在整个‘符号域’肆虐, 亦如生物符号学所断言” (Petrilli, 2007: 314), 指出彼得里利持论过于绝对: (1) 在整个生物界, 并非所有的有机体都能思考, 且仅具备思维能力的有机体才符合这一持论观点; (2) 生物域中并非所有成员都具备思维能力, 毋宁说翻译或转换能力了, 亦如佩尔克 (Pelc, 2000: 426) 对莫里斯所持类似观点作出的批评一般。霍夫梅耶 (Hoffmeyer, 1998: 287) 于 1993 年借用了符号域的概念, 用指地球上符号过程的总集合^②, 认为生命的符号属性自身就倾向于形成习惯, 即倾向于演化为新的规范: “在本人称作‘符号伦理互动’ (semethic interaction) 这一过程中, 生命系统表现出极端的符号生成行为 (semigenic behavior)。所谓符号伦理互动, 指的是一个物种 (或个体) 所形成的规律 (习惯) 相继被同一物种或另一物种的个体用作 (阐释为) 符号的互动行为, 从而在一个将地球各生态系统整合为一个全球符号域的分支和无休止网络之中, 触发这一物种形成的新习惯最终 (迟早) 成为其他个体所使用的符号, 等等。”

霍夫梅耶从生物学角度阐述的符号网络 (符号域或曰符指关系) 不但蕴含了动态性、系统性、层级性、历时性 (或进化性)、关联性, 还体现出符号主体之间存在的类似宇宙万物相关联的全息性。因此, 霍夫梅耶 (Hoffmeyer, 1996: vii) 认为: “符号域^③就是一个酷似大气层、接近地表的水圈 (hydrosphere) 和生物域一般的域, 渗透到其他域的每一个角落, 融合了各种形式的交流: 音响、气味、动作、颜色、阴影、电场、热辐射、化学信号、触摸、各类光波等形式, 简而言之就是生命的符号。”

霍夫梅耶 (Hoffmeyer, 1997: 940) 以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为出发点, 将符指过程视为理解生命过程的核心所在, 即“符号而非分子, 乃生命研究的基本单位所在”。从这一角度看, 霍夫梅耶的符号域与生物域重合。但是霍夫梅耶又进而认为, 从符号学角度看, “生物域属归结论范畴, 须从更为综合的符号域范畴加以理解” (ibid.: 934)。因此, 霍夫梅耶指出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 即所有的动植物或生物生存于一个意指的世界之中, 且一个生物所感知的一切都为某意指某事物。

鉴于此, 笔者根据翻译符号学中符指过程和符号活动 (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转换的类型) 有关译域划分的需要以及贾洪伟 (2016b, 2018) 与 Jia (2017, 2019) 所奠定的思想基础, 将洛特曼的符号域改写为人类符号赖以存在的民族文化所形成的传统载意空间介质 (即非新技术介质), 这一空间可从符号类型上分为有形符号空间和无形符号空间, 从民族文化为参考点可分为内部符号空间和外部符号空间, 二

者又可以时间维度细分为历史符号空间和当前符号空间。因而,同一民族文化同一历史时期或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次空间之间,不论是互动还是转换,都没有超出民族文化的空间范畴,故而属于域内翻译。不同民族文化同一历史时期或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空间之间的互动与转换,跨越了民族文化所形成的空间界限,故而属于域际转换。从一个民族文化空间的某一介质形式走入同一种民族文化不同介质(尤其是新技术介质)构成的多重介质合成的复合型空间,抑或是走入不同民族文化不同介质构成的多重介质合成的复合型空间属于超域翻译。有关三域的具体细节以及各自之间的限度与下位范畴关系将在下文论及。

三、域内翻译

有关域内翻译范畴,贾洪伟(2016b: 15)认为,内部空间的符号转换相当于雅可布森的语内翻译范畴,关涉一个恒量文本或多个恒量文本在同一民族语言文化内部的转换和融合,可细分为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以及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并以实例说明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三类转换。细思之下笔者发现,贾洪伟(2016b)有关域内翻译范畴的阐述存在如下问题:(1)以符号分类为核心,只涉及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的三类转换,将内部空间的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之间的三类互动与交融混杂于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的转换之中,不免将符号转换与内部空间的符号活动混为一谈;(2)以语言文化为轴心,排除了非语言文化和非语言符号活动,不免将翻译作为符号活动作狭义处理,与翻译符号学的命意不符;(3)将符号域的内部空间等同于(相当于)雅可布森的语内翻译,囿于语言符号范畴,排除了非语言符号的参与,缩小了域内翻译的指称范围,同时也否定了提出新术语指称新范畴的必要性和应有价值。

Jia (2017: 40)则作出如下界定: *the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inner space through time or between different styles at one given period of time, though similar to Jakobson's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is not limited to linguistic sign activity, so we call it intrasemiospheric translation* (内部空间不同时期或特定时期不同风格之间的转换,尽管与雅可布森的语内翻译相似,却不局限于语言符号活动,因此命名为域内翻译)。相对来说, Jia (2017)有关域内翻译的界定虽然比贾洪伟(2016b)更为严谨,但蕴含着域内翻译仅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在同一文化范畴(如前文化范畴的界定存在疏漏)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之间的转换,忽略了大脑思维符号作为无形符号的参与和互动。而该文有关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三种转换也过于笼统。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有必要将域内翻译重新定义为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之间的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三类符号转换,关涉一个恒量符号文本或多个恒量符号文本在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部的阐释、转换、关联与融合。笔者拟在此定义基础上确定域内翻译(即内部空间)所涉及的符号转换类型,厘定域内翻译的符号活动层次。

首先,从符号转换类型说,域内翻译范畴涉及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和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三种符号类型。在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分为五种情况:(1)有形符号的语言符号转换为语言符号,如读书看报后,读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将古汉语译为白话,以自己的言语复述和解释相关文本的内容,将小说改编为剧本或台本,根据自身的意图将不同文本的内容整合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布局的符号文本;(2)有形符号的语言符号转换为非语言符号,如阅读产品安装手册,按照操作步骤安装产品,或是看着瑜伽演练视频,按照指令做出相关动作;(3)有形符号的语言符号转换为语言+非语言符号综合文本,如阅读剧本或台本,按照要求说着台词,做出各种舞台动作;(4)有形符号的非语言符号转换为语言符号,如车内副驾驶看着交警手势,以语言告知司机的行驶指令,以及打车乘客看着自身设定的建筑物路标,以语言告知出租车司机行驶的指令;(5)有形符号的非语言符号转换为语言+非语言符号综合文本,如太极拳师傅看着演练视频,以语言口令和招式教授练习者。同一民族文化范畴中的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分为三种情况:(1)有形符号的语言符号转换为大脑思维符号,如看书读报引发的深度思考;(2)有形符号的非语言符号转换为大脑思维符号,如看到民族舞蹈引发的有关街舞的构思,以及看到动物行为引发的武术套路构思;(3)有形符号的语言+非语言符号综合文本转换为大脑思维符号,如看到街头巷尾青少年口吐脏话脚踹电线杆引发的有关当前教育教学的思考。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的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也分为三种情形:(1)大脑思维符号,即思辨、思考、构思等过程产生的思维符号转换为语言符号,如将酝酿一段时日的构思,以语言或文字公布于众;(2)大脑思维符号转换为非语言符号,如将构思的舞台灯光、布景设计呈现于彩排之中;(3)大脑思维符号转换为语言+非语言符号,如阅读剧本后,导演以语言和行为指导演员彩排和演练。

其次,同一民族文化范畴的内部空间还涉及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之间的互动、转换和交融。从符号活动的实质看,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的转换存在三种情况:(1)历史空间文本转换为历史空间文本,如择选若干部《元杂剧》文本中的精华篇部,汇编为某一主题的选集,以及在浩如烟海的唐宋诗歌中择选出一百首汇编成集;(2)现代空间文本转换为现代空间文本,如将散落于报端和书籍中的季羡林散文汇编成册,以及将韩寒作品改写成剧本或译写为民族语言;(3)历史空间文本转换为现代空间文本,如将古诗词译写为现代白话文,将中世纪英语写就的莎士比亚作品改写为现代英语。

综上所述,域内翻译范畴所指称的不仅仅是以语言为焦点的传统语内翻译,反倒是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的所有符号指过程和行为,因为举凡是涉及符号文本的变更与转换均属于广义的翻译行为,囊括了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的编译、选译、回译(或曰反向翻译)等符号活动,故而域内翻译范畴是此前传统翻译学所没有涉及和关注的。

四、域际翻译

有关域际翻译范畴,贾洪伟(2016b: 16)认为,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内外部符号介质)之间的符号转换,我们称之为域际翻译,包括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三类转换,涉及一个恒量文本或多个恒量文本在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换,或在同一民族语言文化范畴中内外部空间介质的变换,如有形符号文本到大脑思维文本,更为典型的是一个恒量文本或多个恒量文本在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换,即传统译论中的翻译本体。贾洪伟(2016b)大体上存在如下四个问题:(1)内外部空间(符号域)的界定和划分,与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依存的内外部物质介质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不易理解和区分;(2)仍以语言符号为轴心,将非语言符号活动排除在外(与文内举例说明存在内部逻辑矛盾),囿于狭义翻译所指范畴,与翻译符号学之广义符号活动界定相矛盾;(3)将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有形符号到无形符号文本的转换错归为域际翻译范畴,错将中华民族文化范畴内的少数民族符号文本与汉语文之间的转换归入域际翻译范畴;(4)不论是理论阐述还是例证,较之翻译学虽有一定程度的范围拓展,但仍一定程度上存在逻辑结构上的不足。

Jia(2017: 41)的有关界定略有不同,认为“内外部空间之间的符号活动就是域际翻译(intersemiospheric translation)”,“涉及一部或多部符号文本自内部空间向外部空间(即不同空间之间)的转换,反之亦然”。这一界定似乎比贾洪伟(2016b)更为严谨,尤其就该文本作为一个思想系统而言,但有关贾洪伟(2016b)存在的问题对Jia(2017)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只是程度的轻重而已。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有必要将域际翻译重新定义为不同民族文化范畴内历史空间和现代空间之间的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的三种转换,关涉一个恒量文本或多个恒量文本在不同民族文化范畴之间的阐释、转换、关联与融合。笔者拟在此基础上确定域际翻译所涉及的符号转换类型,厘定域际翻译的符号活动层次。

首先,就符号转换类型而言,域际翻译范畴涉及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的三类转换。在不同民族文化范畴内,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分为如下五种情况:(1)有形符号的语言符号转换为语言符号,如阅读外文书报,以母语复述和解释相关文本的内容,以及将外文小说、剧本、资料等转换为其他语言符号文本,或根据自己的意图将不同的外文文本内容整合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符号文本;(2)有形符号的语言符号转换为非语言符号,如阅读外文产品安装手册,按照操作步骤安装产品,以及外国人观看汉语太极拳演练视频,模仿视频操练;(3)有形符号的语言符号转换为语言+非语言符号综合文本,如参阅外文材料,在实验室内以母语交流并演练实验步骤;(4)有形符号的非语言符号转换为语言符号,如观看外国人演出的戏剧,以母语与同伴交流演出问题;(5)有形符号的非语言符号转换为语言+非语言符号综合文本,如观看太极拳演练视频,以演示招式为辅助,以外语口令教授太极拳。不同民族文化范畴中的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分为三种情况:(1)有形符

号的语言符号转换为大脑中的思维符号，如阅读外文书报引发的以本民族语言符号为中介的思维活动；（2）有形符号的非语言符号转换为大脑中的思维符号，如观看外国人舞蹈演出或乐曲演奏转换为以本民族语言符号为中介的思维符号活动；（3）有形符号的语言+非语言符号综合文本转换为大脑中的思维活动，如观看外国人演出的歌剧，以本民族语言符号为中介的思维符号。不同民族文化范畴内的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因大脑思维符号所倾向于本族语为中介，一旦转换为非语言符号，也就无法辨别是域内还是域际翻译，故域际翻译范畴不考虑此种情形，故本范畴大体分为两种情形：（1）大脑思维符号转换为语言符号，如以母语酝酿一段时日的演讲构思，以外语形式呈现于听众面前；（2）大脑思维符号转换为语言+非语言符号，如好莱坞的华裔导演以舞台行为为辅助，以汉语指导中国演员演练和彩排。

其次，域际翻译范畴还涉及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之间的文本阐释、转换和交融。从文本符号活动的实质看，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的转换存在三种情形：（1）历史空间文本转换为具有他民族相似特征的历史空间文本，如苏曼殊、胡适等将雪莱诗歌译为汉语古体诗，严复所译的古汉语《天演论》等；（2）现代空间文本转换为现代空间文本，如将现代改写本莎士比亚戏剧译为现代白话文；（3）历史空间文本转换为现代空间文本，如将雪莱诗歌译为现代白话文，将亚里士多德《诗学》译为现代白话文等。

综上所述，域际翻译范畴所指称的不仅仅是以语言为焦点的传统语际翻译，反倒是不同民族范围范畴内的所有符指过程和行为，因为凡是涉及不同民族文化范畴内符号文本的变更与转换均属于广义的翻译行为，囊括了不同民族文化范畴之间的编译、选译、回译（或曰反向翻译）等符号活动，故而域际翻译范畴是此前传统翻译学在范围和内容上考虑不充分的。有关域内与域际翻译范畴之同异问题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1）域内翻译与域际翻译虽然都关注的是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前者侧重的是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的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后者则是不同民族文化范畴之间的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2）域内翻译与域际翻译虽然都涉及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三类转换，但有关非语言符号与无形符号部分，域内翻译范畴更为常见，域际翻译范畴虽然也存在，但因受不同民族文化因素的制约，常见度略低；（3）二者均属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区别在于符号和符号活动所依存的民族文化空间，其中文化不但是符号域赖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更是区分符号文本界限的主要因素。

五、超域翻译

有关超域翻译范畴，贾洪伟（2016b：16）认为：“一部小说历经域内（汉语小说转换为剧本和台本）或域际范畴（英语小说转换为汉语剧本和台本）的二次符号转换行为，结合声效、舞台行为、妆容、服饰、灯光、布景等，最终形成音、声、光、影等为一体的多媒介符号合成文本，还可配以双语对应字幕，保存为可多次反复播放的电子文本。其中历经同一内部空间媒介的‘剧本→台本’之域内翻译，或

‘小说→剧本→台本’之二次域内翻译,到同一内部空间声、光、影、音不同介质间的域际翻译,再到内外部空间之间的对应字幕配置这一域际翻译,文本从纸媒承载的符号文本转换为以舞台或荧屏为承载介质的符号综合文本,构成了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超域翻译行为(superasemiospheric translation)。”Jia(2017: 42)也以大致相似的例证为手段,将纸媒到舞台或荧屏的这一多媒介合成符号文本界定为超域翻译。

如果不联系前文的域内和域际翻译范畴的界定和分析,这两个界定都可以单独存在,一旦将域内、域际和超域作为一个三元译域系统看待,这两个界定似乎就不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大体而言,上述界定存在如下问题:(1)举例界定并不科学,无法有效地抓住术语和概念的本质内涵和属性特征;(2)既然以符号域为切入点,且这一三元译域系统中的域内和域际翻译界定均以域为参考点,超域翻译的界定也应应以域为切入点,而不是符号文本的转换行为和活动;(3)现有界定容易让人误以为超域翻译是域内与域际翻译的上位概念,实则没有突出民族文化范畴中符号文本的传统载意空间,转向科技大发展背景下的新介质多模态载意空间这一现象,以及这一转变所促生的多介质多模态合成符号文本这一本质特征。因而,有必要对超域翻译加以重新界定。所谓超域,指的是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超出传统纸媒为主体的载意空间,进入多介质多模态载意空间,由声响、灯光、言语行为、肢体行为等多元素之综合,构成反复播放性多模态多介质合成符号文本,此过程和现象名为超域翻译。实质上,超域翻译也涉及不同空间之间的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的转换。

首先,超域翻译范畴下的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涉及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语言+非语言符号转换为声光影音等多元素构成的多介质合成符号文本,如汉语小说经剧本和台本转换为声光影音等元素构成的舞台演出以及可反复播放的多模态多介质合成符号文本(其中,舞台为一种集声光影音等物质介质构成的综合性物质载体,反复播放的多介质合成文本集声光影音等介质合成的屏幕载体文本),此为域内翻译范畴内的超域翻译行为。如基于外语小说派生的汉语情境下的舞台演出和反复播放的多介质合成文本为域际翻译范畴内的超域行为。一场舞蹈表演构成的符号文本转换为风格各异的舞台演出或反复播放的合成文本,若是在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就是域内翻译范畴中的超域翻译行为,若是不在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就是域际翻译范畴中的超域翻译行为。一场融合台词和舞台行为的演出转换为面向非在场观众的舞台演出或可反复播放的合成文本,若在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就是域内翻译范畴的超域翻译行为,若不在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就是域际翻译行为。

其次,超域翻译范畴下的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主要是舞台演出和反复播放的多介质合成文本转换为观众大脑内部的思维符号,若演出和合成文本与大脑思维符号同属一个民族文化范畴内的符号活动,则是超域翻译范畴下的域内翻译行为;如果不同属一个民族文化范畴内的符号活动,则是超域翻译范畴下的域际翻译行为。

再次,超域翻译范畴下的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主要是指大脑构思的思维符

号文本转换为舞台行为符号和多介质合成文本符号，也同样涉及域内和域际翻译范畴下的超域翻译行为。与此同时，超域翻译也涉及历史符号文本转换为多介质合成的历史符号文本、历史符号文本转换为多介质合成的现代符号文本、现代符号文本转换为多介质合成的现代符号文本三类符号活动，如果在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则是域内翻译范畴的超域翻译行为，如果不在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则是域际翻译范畴的超域翻译行为。

由此可见，相比域内翻译和域际翻译，超域翻译的本质和内涵要复杂且丰富，不但涉及超域翻译范畴下的域内翻译和域际翻译，也会涉及域内翻译和域际翻译范畴下的超域翻译行为。从学科史的角度讲，域内和域际翻译的现象不但历史相对悠久，且常见度较高，超域翻译则随着科技发展，尤其是电子工业的发展，采用录音、录像等新技术手段，保存舞台行为，供反复播放的多介质合成文本符号活动。

六、结语

雅可布森于 1959 年提出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因存在界限不清、层次错置等问题，自 1980 年代一直受到国际学界的批评和指摘，但这些反思性作品依然存在以狭义翻译界定为参考，将重心放在文学作品的语际翻译范畴上，忽视了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不同文体风格层次的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的阐释、转换和融合（即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不同民族文化范畴内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以及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部或不同民族文化范畴之间的有形符号和无形符号转换为多介质合成符号文本的行为、过程和现象。因而，有必要参考和重新界定洛特曼于 1984 年提出的符号域，结合翻译符号学研究的需要以及符号活动与符指过程之现实，提出域内翻译、域际翻译和超域翻译三类范畴。

域内翻译乃同一民族文化范畴内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之间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三类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其下又涉及语言符号（语言文字符号和语言思维符号，后者为笔者称之的无形符号）、非语言符号以及语言+非语言综合文本符号的转换。域际翻译乃不同民族文化范畴内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之间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的三类转换，其下也涉及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以及语言+非语言综合文本符号的转换。超域翻译则是符号活动与符指过程超出传统纸媒为主体的载意空间，进入由声响、灯光、言语行为、肢体行为等多元素构成的反复播放性多介质合成文本符号（即屏幕承载的影像符号文本），也涉及不同类型空间的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的转换。

有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的批评与反思以及对批评与反思文本作出的批判分析有助于思考和认识符号活动和符指过程的本质与转换规律，更有助于翻译学有关翻译本质、翻译过程、文本构成、心理黑匣子等层面的思考和探究。基于对雅可布森翻译三分法的反思以及对洛特曼符号域的重新界定提出的域内翻译、域

际翻译和超域翻译三种译域范畴不但有助于翻译符号学乃至普通符号学拓宽理论视角,更有助于构建符号学分支理论,验证符号学理论应用的威力,同时也有助于为传统翻译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视角。

注释:

- ① 在《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1959)中雅可布森(Jakobson, 1959: 233)认为,语言符号的了解应依翻译而定,以皮氏符号的三元观为据,将翻译视为皮氏“真正符号活动”(genuine sign-activity)与“退化符号活动”(degenerate sign-activity)的另一种阐述形式(Gorlée, 1994: 157),因而提出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or rewording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other signs of the same language)、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or translation proper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igns of some other language)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or transmutation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igns of nonverbal sign systems)。
- ② 对于霍夫梅耶提出的这一观念,美国符号学家迪利(John Deely, 2001: 629)将洛特曼的符号域归为狭义范畴,建议用符号域(signosphere)命名霍夫梅耶提出的广义符号域范畴。
- ③ 为了更好地区别霍夫梅耶的符号域与洛特曼的符号域,我们不妨将霍夫梅耶的符号域命名为符号圈以示区别。

参考文献:

- [1] Deely, J. 2001. *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 The First Postmodern Survey of Philosoph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 [2] Eco, U. 2001. *Experiences in Translation*[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3] Gorlée, D. 1994.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M]. Amsterdam: Rodopi.
- [4] Gorlée, D. 2010. Metacreations[J]. *Applied Semiotics*, (9): 54-67.
- [5] Hoffmeyer, J. 1996. *Signs of Meaning in the Universe*[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6] Hoffmeyer, J. 1997. The Swarming Body[A]. In I. Rauch et al. (eds.) *Semiotics around the World: Synthesis in Diversity.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Berkeley 1994*[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7] Hoffmeyer, J. 1998. The Unfolding Semiosphere[A]. In G. Van de Vijver et al. (eds.) *Evolutionary Systems: Bi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elec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C]. Dordrecht: Kluwer.

- [8] Jakobson, R.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A]. In A. Fang et al. (eds.) *On Translation*[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9] Jia, Hongwei. 2017. Roman Jakobson's Triadic Division of Translation Revisited[J]. *Chinese Semiotics Studies*, (1): 31-46.
- [10] Jia, Hongwei. 2019. Semiospheric Translation Types Reconsidered from the Translation Semiotics Perspective[J]. *Semiotica*, (231): 121-145.
- [11] Kotov, K. & K. Kull. 2011. Semiosphere is the Relational Biosphere[A]. In C. Emmeche & K. Kull (eds.) *Towards a Semiotic Biology: Life Is the Action of Signs*[C].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Press.
- [12] Lotman, J. 1984. O Semiosfere[J]. *Sign Systems Studies*, (17): 5-23.
- [13] Лотман, Ю. М. 1999. *Внутри мыслящих миров*[M].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14] Pelc, J. 2000. Semiosis and Semiosics vs Semiotics[J]. *Semiotica*, (3): 425-434.
- [15] Petrilli, S. 2007. Interpretive Trajectories in Translation Semiotics[J]. *Semiotica*, (1): 311-345.
- [16] Torop, P. 2002. Translation as Translating as Culture[J]. *Sign Systems Studies*, (2): 593-605.
- [17] Toury, G. 1986. Translation: A Cultural-semiotic Perspective[A]. In A. Sebeok (ed.) *Encyclopedic Dictionary*[Z].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18] 黄忠廉. 2015. 翻译批评体系符号学考量[J]. 外语教学, (4): 95-97, 113.
- [19] 贾洪伟. 2016a. 翻译符号学的概念[J]. 外语教学, (1): 94-97.
- [20] 贾洪伟. 2016b. 雅可布森三重译域之翻译符号学剖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5): 11-18.
- [21] 贾洪伟. 2016c.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J]. 山东外语教学, (3): 90-100.
- [22] 贾洪伟. 2018. 论翻译符号学的符号分类与转换[J]. 山东外语教学, (1): 111-118.

(责任编辑: 王冠珠)

the meaning of life implied.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xistence of suicide shops means to acknowledge the suicide, people's suicidal needs, face suicide directly and even accept the suicides' ideas. However, suicide prevention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multimod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 power of life in the alternative stories, the dialogism among voices on suicide through lexico-grammar, facial expression, action, colour, intonation and opposition, denial, acknowledgement and acceptance resources in the heterogloss deconstructs suicide and opposes suicide. The meaning of life is constructed by differences and echoes in the dialogism.

Key words: voice; suicide; animation film;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engagement resources

The Construc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 A Multimodal Analysis of *Goodbye, Grandma Erma*

ZHAO 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ultimodal construc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in a children's picture book on death education *Goodbye, Grandma Erma*. Based on Painter, Martin and Unsworth's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visual narrative, Martin and Rose's appraisal theory,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personal meaning in images and tex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are constructed through different visual and verbal commitment, and coupling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rdinary people do not avoid death, and talk about it openly; dying people dare to face death, make decisions by themselves, and choose to complete the last journey of their life with dignity and quality; family members of dying people respect the wishes of dying people, accept the death calmly and optimistically. This study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hildren death education research,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use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 on death education.

Key words: multimodal analysis;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picture book on death education

On the Veridiction of Photo Signs

YU Xin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otos and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Photos belong to icons, but their users can use them as indexes to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certain specific things. Photos can also be transformed into symbols. The authors and readers of photos can give the same or different interpretants, thus photos become symbols. Like other signs, photo signs can be used to lie. The veridiction of a picture is a communication process. The intention meaning of the sender, the text meaning of photo and the interpretive meaning of the receiver are presented in different forms to form several fixed modes of veridiction.

Key words: sign; photo; interpretation; veridic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Semiospheric Translation Typ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JIA Hong-wei

Abstract: Due to the logical problems of unclear boundaries, staggered parallels, etc. Roman Jakobson's triadic division of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and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proposed in 1959 has been criticized by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researchers. However, they still linger on literary texts in terms of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in the strict sense, and ignore the sign activities and semiosis between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signs in the same or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in the same or different ethnic cultures. It is necessary to refer to and redefine the term semiosphere proposed by Juri Lotman in 1984 and adopted by Jesper Hoffmeyer in 1993, and elaborate the natur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intrasemiospheric translation, intersemiospheric translation and

suprasemiospheric translation.

Key words: intrasemiospheric translation; intersemiospheric translation; suprasemiospheric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analysis

A Study of the Spatial Complexity of Language Education Symbolic Texts

LI Yu-feng

Abstract: Edusemiotics, with semiotics a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explores semiotic problems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 to establish an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emiotic theory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semiot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patial complexity reflected in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educatio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xplores the symbolic spatial narrative of language education, so as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semiotics in language education, provide a feasible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the educational semiosis to condense various forces and requirement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us effectively 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meaning order of text space and fully developing the conceptual fluency.

Key words: edusemiotics;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spatial complexity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ree Types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in English Grammar Teaching of English Majors in China

SHUANG Wen-ting

Abstract: The aim of teaching English grammar of English majors in China is systematic mastery and proper use of English grammar. English grammar teaching should also aim a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throug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grammar.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include three aspects, i.e.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aesthetic thinking ability.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aesthetic thinking ability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the former denotes scientific quality and the latter humanistic quality.

Key words: English major; grammar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A Study of the Flipped-Blended EAP Teaching Based on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LI Qian & LIAO Kai-hong

Abstract: With the core target of developing students' critical ability, the basic guidance of blended learning and the auxiliary teaching tools like WeChat Official Platform and Weibo Learning Community etc., this research applies the current micro-lecture resources to carry out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of 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to build the flipped-blended EAP teaching mode oriented by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parallel teaching experiment and the evaluations approaches, including language test, questionnaire and feedback interview etc.,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mpirical studies a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mode's effectiv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ability and emotion. It find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effects of the flipped-blended EAP teaching based on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traditional face-to-face teaching, and students have generally shown their active attitude of recognition, but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still has to be improved reasonably.

Key words: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flipped classroom; blended learning;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